

西安古代户口数目小议

李 之 勤

西安古称长安，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历史上的西周、秦、西汉、新、后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一个王朝和东汉、西晋等王朝的末期，都曾建都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咸阳等地；推翻王莽新朝的绿林、赤眉等部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和唐末黄巢起义军建立的大齐政权、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也都曾定都在这里。西安被选定为都城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之久。其中作为全国统一政权首都的时间也有八、九百年，比我国其他古都如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城市作都城的时间都长。作为全国的首都，历史上的西安，尤其是汉、唐“盛世”的长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建筑雄伟，人口众多。

现在，西安市是陕西省的省会，西北五省、区最大的城市。市区人口一百八十五万，加上市辖的长安县的人口，总数在二百五十万以上①。古代的长安又有多少人口呢？却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近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武伯纶老同志编著的《西安历史述略》一书，书中根据有关史料对古代西安的户口变化情况作了概括的论述。认为西汉首都长安城内的人口“当在五十万左右”②。而唐代首都长安城

内的人口则“有一百多万”^③。还介绍了唐朝灭亡，长安失去首都地位之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长安户口严重减耗的情况是，北宋中期，长安“户口不过万家”，清朝末年，“长安咸宁两县合计人口才仅十一万多”，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自唐亡以后直到清代末年，长安实际是处在长期停滞状态之中”。^④

认真考察一下《西安历史述略》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它与西安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是有相当距离的。因为它夸大了汉唐长安城内的户口数目，而对北宋以至清末的户口数目却有意贬低：认为失去了首都地位的长安，其户口数目不仅大幅度下降，而且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忽略了它的起伏变化；对某些资料的解释和运用也有主观臆断致与原意不符之处。

关于西汉时期的户口数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统计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全国共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平均每户五口。其中首都长安县八万零八百户，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口，平均每户三口多。《西安历史述略》认为“这个数字显然偏低，每户以五口计，当在四十

① 《陕西省地图集》第四十一—四一四图说明。

② 《西安历史述略》第一〇四页。

③ 同上 第一六四页。

④ 同上 第二七一页。

万以上。若将皇族、士兵及其他人员计算在内，当在五十万左右”①。

但这种推论是很成问题的。因为，

第一，《汉书·地理志》所载上述长安的户口数字，系包括整个长安县而言，并不是专指长安城内。而汉代首都长安的管辖范围，虽然比现在的西安市和长安县要稍小一些，但除城内部分外，仍有更为广大的乡村。《西安历史述略》把包括长安城内和城外户口的总数当作长安城内的户口数字，显然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夸大了长安城内的户口数字。

第二，《西安历史述略》认为上述西汉长安每户平均三口，八万多户共二十四万多口的统计数字“显然偏低”，改按一户五口计算，也不完全合乎历史实际。因为西汉全国户口统计虽然接近一户五口，但陕西关中地区各郡县的每户平均人口却都大大低于此数。如左冯翊二十县每户平均口数最高，约三·九口。右扶风二十一县次之，平均约三·八六口。京兆尹十二县最低，平均每户只有三·四口。作为全国的首都，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同治所的长安，其每户平均人口为三口稍强，是与上述总情况大致符合的②。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当时的户口统计数字完全正确而无隐匿不实之处。我们也认为，

① 《西安历史述略》第一〇四页。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当时的户口统计数字是不可能完全精确的，隐匿而不入户籍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但这却是当时户口统计的一般情况，而不是长安附近特有的问题。就长安地区户口统计的特点而言，一方面，长安是当时贵族、官僚、大地主等特权阶级集聚之处，存在着它们持权并法隐匿户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长安附近是当时全国户口最密集的地区，户口统计又是封建统治者征收户赋、口赋、算赋，征派兵役、劳役的主要根据。汉朝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有必要把长安附近的户口统计搞得更精确些，是明摆着的事实。而首都附近又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力量最强的地方，汉朝统治者把长安附近的户口统计搞得更精确些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西安历史述略》只强调西安附近贵族、官僚、地主等特权阶级众多，户口隐匿情况严重，因而怀疑这个地区的户口统计数字显然偏低。却完全忽略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其统治力量最强的地区，有把户口统计搞得更精确的要求与可能，显然是不全面的。用一般来代替特殊，用全国每户平均口数的五口来代替长安地区每户平均口数的三口，也是不甚妥当的。客观上夸大了当时西安地区的人口数目。

至于皇族，西汉皇帝的儿子都被封为王，王国相当于一郡。王子都被封为侯，侯国相当于一县。被封的王和侯，一般是要“之国”，即离开首都长安前往被封的地区，而不是永远都居住在京城长安的。军队方面，汉朝时守卫京师的南军和守卫皇宫的北军，大都是从三辅及各郡征发来轮番服役的丁壮，总数不过二至四万人。

而且也不是全部驻扎在京城长安城内①。总上可知，所谓汉代长安城内户口“当在五十万左右”的推论，是难免夸大之嫌的。

《西安历史述略》估计唐代长安城内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根据是：

一、《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咸亨元年（公元六五七年）四月，长安仕女观看玄奘法师迎接唐高宗写赠的《慈恩寺碑》典礼的有“百余万人”②；

二、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第八《论今年权停选举状》说：“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

三、韩愈诗《出门》和元稹诗《遣兴十首》之二分别有“长安百万家”、“城中百万家”之句③。但仅仅根据这些资料就说唐代长安城内有一百多万人口，理由也是不够充分的。因为：

一、关于有一百多万长安士女参观玄奘法师迎碑典礼的记载，显然并不是根据确切的统计，而是出于有意的夸张宣传。因为即令当时的长安城内确有一百多万人口，也不可能全部停止其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工作，一齐去参加观礼。退一步说，假定当时参加观礼的善男信女真有一百多万人，也不能说他们全都是长

① 《文献通考》卷一五〇《兵考》。

② 《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

③ 《全唐诗》卷三三七和卷三九八。

安城内的长住人口，而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慕名而来的外地群众。

二、韩愈说：“今京师之人不管百万”的背景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〇三年）大旱民饥，唐朝政府宣布暂停当年的选举以免增加首都长安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韩愈不赞成这个办法，提出意见说：“臣伏思之，窃以为十口之家，祇以一二之人，于食未有所费。今京师之人不管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计之，诚未为有所损益。又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举选者皆费持资用，以有易无，未见其弊。”① 要求当年的举选照常进行。为此，在他估计为举选而将要增加的京城流动人口时，可能有意从少，而估计当时长安原有人户的数目时又有意从多。按唐代首都长安城下辖长安、万年两县，共治长安城中。北宋宋敏求编写的《长安志》卷十《西市》条说唐代《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同上卷八《东市》条又说：“万年户口减于长安”。合计两者可能有八万多户。依韩愈一家十口计，百万人合十万家。两者相差还不算很多。但每户十口这个水平，却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了。因为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全国平均每户人口是一户五·七六口。关中地区平均一户五·七口；而京兆府每户平均只有五·四口①。

唐宋文学家孙樵《复佛寺奏》中也曾把当时的“中户”称为

①《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所载户口推算。

“十口之家”^①。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长安与洛阳》的《长安的人》一节中，就因此说长安的“户数为八万，一户人口为十人强那么总数约为八十万，这是长安一般任民和官吏及其关系者的总数”。再加上士兵、宗教方面的人和上京考试者、旅行者^②也得出唐代长安总人数为一百万的结论^③。这种估计也是偏高了，因为一户十口，不仅不能反映当时每户平均口数的实际，也不是当时多数人户所能达到的。

而且在当时的人口统计中，中户很可能并不占总人户的大多数。按唐朝民户原分上、中、下三等，但按三等定户只实行了三年就又细分为九等，那就是把上、中、下每等又再分一个上、中、下^③。在全国或首都长安的户口中，中等人户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因未保留下来系统、详细的资料，不好妄事猜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收录了敦煌地区唐代户籍残件多种，可供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参考。该书所收十一件户籍残卷中，载明户等的有六件，共四十六户。这些户全部是下户而无一户属于上户或中户。而且四十六户下户中，下中户只占十七户，下下户就有二十九户。可见当时九等入户中，下户数目最多，而上户和中户则是比较少的。同书第八十七至一〇七页，题为《邓延富等户残卷》，该书

① 《孙樵集》卷六，四部丛刊缩印本。

② 《长安与洛阳》页二九。

③ 《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

编者认为可能不是户籍而是公田制的计口授田计帐，户等仍按三级而未分九等，所列六户四十一口，平均每户六·八三口。其中上户三户二十三口，平均每户七·三口，中户三户十八口，平均每户六口。也都与平均每户十口相差甚远。

三、至于韩愈和元稹“长安百万家”、“城中百万家”等诗句，无非盛言唐代长安户口之多，并不是确切统计或近于事实的估计，是不应拘泥的。如果信以为实，再依韩愈所说的十口之家，也就是一户十口的标准进行推算，那么，唐代的长安，甚至仅仅在长安城内的人口就有一千多万，超过当时京兆府二十四县人口统计数目的五倍，相当于全国人口统计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了。其属于文学上的夸张而并不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不是十分显然的吗？在唐诗中，这种夸张渲染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还有说长安有一千万人，千万家、万万家的如：

“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夜吹笛”（《全唐诗》卷二〇一，岑参《秋夜闻笛》）。

“南山三十里，不见踰一句、日日不断雨，愁杀望山人。……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谁家最好山，我愿为其邻”。（《全唐诗》卷五七一，贾岛《望山》）。

“长安千万人，出门各有营。唯我与夫子，信马悠悠行”。（《全唐诗》卷四二八，白居易《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

见赠》)。

“日过千万家，一家非所依”。(《全唐诗》卷五一八，雍陶《长安客感》)。

“看偏花无胜此花，翦云披雪蘸丹砂。开当青律二三月，破却长安千万家。”(《全唐诗》卷七〇八，徐铉《牡丹花二首之一》)。

“二年寒食住京华，寓目春风万万家”(《全唐诗》卷六四七，胡曾《寒食都门作》)。

这些关于长安人口有万万家、千万家、千万人的诗句，当然是出于诗人的夸张而不能信以为实的。不仅关于长安户口的诗句如此，对当时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全唐诗》卷二六一魏万《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说：“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卷五四〇李商隐《宋玉》诗说：“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卷三九七元稹《楚歌十首》之一说：“楚人千万户，生死系时君”。卷二二七杜甫《水槛遣心》之一说成都“城中十万户”。白居易的诗中也多次提到他当太守的苏州“版图十万户”、“一郡十万户”、“十万夫家供课程”、“十万户州尤觉贵”①。这些都应理解为诗人的夸张，而不能

① 《全唐诗》卷四四四《自咏五首》：四四七《登阆山闲望》：

《题新馆》：《自到郡斋，仅经旬日，万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中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

认为现在的江苏南京、苏州、湖北江陵、四川成都等在唐代就有十万、百万甚至上千万户口。因为根据当时的统计资料，开元天宝年间成都府所属十县户口的总和只有十六万九百多户，而苏州的十万八百多户也是苏州所属十县的户口的总和。都不是专指成都和苏州两个城市的人口①。

四、从现存关于唐代的户口统计来考察，也很难得出当时长安城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结论。据有关史书记载，唐代人口最多的时期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开元二十八年全国有八百四十多万户，四千八百四十多万口；天宝末年全国户口达到九百多万户，近五千三百万口②。这时，唐朝首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共辖二十三县，有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户，一百九十六万零一百八十八人，平均每户五·四人③。其中长安县和万年县共治长安城中，城内有皇室宫殿、百官衙署、东西两市和一百〇八个坊④，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但从面积来说，它毕竟是长安、万年两县管辖范围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城外

① 《旧唐书》卷三十八和《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

《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

② 《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

③ 《旧唐书》卷三十八、《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卷七

还有一百〇四个乡的广大郊区①。从人口说，唐朝的制度是“百户为里，五里为乡”②。所以，按一般规定，一个乡应有五百户，一百〇四个乡就应有五万户左右。以京兆府每户平均五·四口计算，居住在长安城外的长安、万年两县各乡的人口当有二十八万。如果长安城内的人口有一百多万，城乡合计就合有一百二十多万甚至一百三十多万了。且不说这个数字过大，与当时全国各地的人口统计情况不合，就是从当时京兆府各县人口分布的密度分析，它也是极不合理，因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说唐代长安有一百三十万人口，也就是说，长安、万年两县的人口在京兆府二十三县中占有百分之六十八，而其他二十一县才占有百分之三十二；长安、万年两县平均人口每县都在六十万人以上，而其他二十一县的每县平均人口只有三万多。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因为当时关中地区的华州三县，平均每县户数已在一万一千以上，口数也在七万以上。同州六县，平均每县户数也有一万〇一百多，口数也在七万以上③。一般而论，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经济、文化最发达而又是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兆府各县，每县平均人口理应高出其他各州之上。事实上，京兆府二十三县每县平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县注说：“唐四十五乡”；卷

十二长安县注说：“唐五十九乡”。

② 《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

③ 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推算。

户口已达一万五千多，人数已达八万多，不论是每县平均户数和平均人口，都超过了华州和同州。所以，即令长安、万年两县以外的京兆府二十一县的平均人口与华州和同州相同，也是每县一万多户、七万多口附近，那么，京兆府二十一县也应有二十多万户，一百五十多万口，因而长安、万年两县的户口总数就只剩下十多万户，四、五十万口人了。另外，如果依《长安志》所记长安、万年两县约有八万多户，京兆府平均每户五、四口计算，唐代长安城内的总人口也不到五十万。如果这八万多户不光是城内人口，还包括两县郊区人口在内，那么长安城内的人口实际数目距离一百多万就更远了。

当然，由于长安是当时全国的首都所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戍卫的士兵、进京的官吏、投考的举子、往来的客商以及其他浮寄、流寓的人口自然很多，也会在长安人口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总不能说这些人口的数量会多到超过当地常住人口的程度吧！

《西安历史述略》关于唐朝衰亡，长安失去首都地位以后户口消长情况的论断，主要是根据陕西省博物馆藏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一〇七四年）《善感禅院新井记碑》所说的“长安、汉唐之故都，当四方之冲要，衣冠豪右，错处其间，连蒙接栴，仅数万家”

这么一段话，和《咸宁、长安续志》关于两县城关户口的统计：咸宁“城关户一万四千〇三十，口六万三千四百六十一”；长安“城关户一万〇四百三十九，口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七”。但既然在汉、唐“盛世”，作为首都的长安就只有八万多户，则北宋时长安“仅数万家”已不能说少。而清末西安户口，据上引《咸宁、长安续志》所载，除两县城关合计十一万多人以外，还有城外各乡的人口。长安县西、西南、南、北四乡十九版，有户三万九千九百四十三，口二十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七；咸宁县东、南、北三乡二十九仓，有户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二，口二十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七。两县城关合计共有十万一千五百七十二户，四十四万九千六百一十四口。根据封建统治者上述统计，清代西安的户口，以户数论超过了汉、唐时的长安，以口数论也已接近极盛时期的唐代长安人口了。《西安历史略述》在论述汉、唐长安人口时总是把城乡人口总数当作城内人口数字，而在论述早已失去首都地位的清代西安人口时，却又抛开四乡大多数人口不管，而把城关人数当作“两县合计人口”总数，进行比较，未免不够客观了。

进一步考察，从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发生后，直到清朝末年的一千多年间，西安户口消长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发现，它并不象《西安历史述略》所说的“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之中，”而是和关中地区以至全国一样，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升降变化的。以唐朝的情况而论，据《唐会要》卷八四记载，在户口极盛的玄宗开元、天宝以后，

全国户口就又有过几起几落，大宝十三载九百六万户，肃宗乾元二年降为一百九十三万户，德宗建中元年升为三百八十五万户，宪宗元和二年降为二百四十七万户，又宗升成四年升为四百九十九万户，其后又复下降，直至唐朝灭亡。京兆府的户口也由开元天宝年间的三十六万余户降为元和中间的二十四万户。万年、长安两县的户口虽然没留下单独的统计数字，一般说来，也是越不出这种全国性升降趋势的影响的。以北宋的情况而论，永兴军路京兆府除去乾祐县，另加旭州、乾州和华县的蒲城、渭南两县，秦凤路凤翔府的周至县，就相当于唐朝京兆府的管辖范围。其户口数字是，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为九万多户，神宗熙宁年间为十一万多户，元丰年间为二十九万多户，哲宗崇宁年间为三十六万多户^①。这说明当时西安地区户口发展的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到北宋末年已经赶上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水平了。由于这时西安已经不是全国的首都，当然万年、长安两县的户口在上述京兆府各州县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可能象汉、唐时期那样突出了。但既然原唐朝京兆府的二十三县宋时平均每县户数已在一万五千户以上，则作为永兴军路京兆府治所的万年、长安两县，每县平均户数自然要比其他各县多的多，西安地区的户数这时至少也应有四、五万了。北宋末年，宋金交兵，关中残破，户口凋零。金世宗大定

① 参考《太平寰宇记》卷二八：《长安志》卷一：《元丰九域志》卷三：《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年间（公元一一六一至一一八一年），是金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人口数字也有所回升。《金史》卷二六《地理志》所载京兆郡十二县的人口也将近十万户。金元之际，战乱更为频繁而激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公元一二八一年），改京兆府为安西路。仁宗皇庆元年（公元一三六一年），又改安西路为奉元路①，而万年县也在金朝时期就已改为咸宁县②。《元史》卷六〇《地理志》载元宪宗蒙哥壬子岁（公元一二五四年），奉元路一录事司、五州、十六县（相当于今西安、铜川二市、渭南、商洛二地区和咸阳地区大部、宝鸡市属武功县、郿县等关中大部分地区），总共只有三万三千九百三十五户，二十七万一千三百九十九口。到了第二年癸丑岁，蒙哥封京兆府为其弟忽必烈的采邑。这时关中尚是“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③。”可见户口消耗之甚。其后虽有所回复，但元末战乱，户口又大为减少。明朝从太祖洪武年间到神宗万历年间（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二〇年），陕西省和西安府的户口大致是逐渐上升的④。明末战乱频仍，户口又复消耗。清初征赋的单位按丁不按户口。户口编审着重统计丁数而不统计人户，而对丁数的统计又不列实际丁额，而

②、《金史》卷二六《地理志》。

①、《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③、同上 卷一五九《商挺传》。

是被折合成下丁的数字②，不好比较。在“滋生人丁永不纳赋”的命令实行之后，才逐渐恢复关于户口数目的统计。据乾隆《西安府志》卷十三《食货志》引《资政录》的统计，当时长安、咸宁两县男女大小将近六十万口③。据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的记载，两县共有八万多户，五十三万多口④。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长安人口二十五万九千一百余，咸宁县人口三十一万五千余，合计五十七万四千一百余口。咸丰以后，陕西爆发了回民起义。其时太平军和捻军相继入陕，清朝政府调兵镇压，战乱十余年。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根据丁口表的统计，长安县人口一十八万五千九百有八，咸宁县人口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一十，合计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一十八口⑤。其后户口又稍有回升。

① 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六《贡赋》三《历代户役》。

② 同 上 卷二五《贡赋》二《户役》。

③ 乾隆《西安府志》卷十三《食货志》上《户口》：“长安县民数男大小口共八万七千一百二十有一，女大小口共五万九千九百八十有九。咸宁县民数男大小口共二十一万五千〇十有二，女大小口十三万七千三百十有五。”

④ 嘉庆《长安县志》卷十《土地志》上《户口》：“嘉庆十七年户三万六千一百六十四，口二十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嘉庆《咸宁县志》卷十《地理志》：“大凡编户四万五千三百四十六，口二十九万八千八百有一”。

⑤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四《地理考》上；卷五《地理考》下。

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五《地理志》统计，清朝宣统年间（公元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两县城关四乡总计共有十万一千五百七十二户，四十四万九千六百一十四口。上述唐以后西安户口随着全国的政治变动而多次大幅度升降变化，以及不止一次接近甚至超过汉唐长安户口水平的情况，显然不是“处于长期停滞状况”一语所能概括得了的。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西安的户口数目，也不应是“不过万家”，而应在万家以上。根据北宋初年编写的《太平寰宇记》卷二八的记载，当时关西道永兴军路京兆府十三县共有主户三万四千四百五十，客户二万六千二百七十六，合计六万〇七百二十六户，平均每县四千八百二十户。其中长安、万年两县为永兴军路和京兆府的治所，其户数自必较京兆府其他各县为多。所以，在熙宁七年以前九十多年，西安的户数就已经超过一万了。再看熙宁年间成书的宋敏求《长安志》卷一的统计，京兆府十三县的户数为五万二千七百二十。如按《太平寰宇记》所载各县乡数计算，平均每乡户数为八百二十三，万年、长安两县十三乡的总户数也在一万以上。而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关中并无大的变故，实际户口数目是理应有所增长而不会减少的。

还应指出，《西安历史述略》对于《善感·禅院新井记碑》引文的解释和运用，都是与碑文的原意不符的。“连瓮接桶，仅数万家”，